

苏联解体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关贵海

当代中俄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对中国而言，俄罗斯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战略、安全、经济等方面，更体现在两国转型模式选择与调整的相互借鉴和影响上。其中，对苏联解体历史教训的总结，已经影响着中国的政治选择。

我们知道，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中国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努力。因此，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对苏联剧变的分析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人在总结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教训时，都在联系着中国自己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经从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吸收了很多东西，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领导，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到单一意识形态主导思想文化领域，两国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当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的问题积累到相当程度，亟须进行改革时，苏联和中国都在观察和考量对方：苏联方面很不情愿仿照邓小平开创的从农村入手的经济优先的中国改革模式，而中国似乎也是在有意避免戈尔巴乔夫政治民主化先行的做法，但同时又力求抛弃苏联经济体制中僵化过时的做法。

应该说，中国党的领导层对苏联内政和外交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是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的。在二十年的论战与对抗过程中，双方其实一直都在极力寻找对方体制、政策和实践中的弱点和缺陷，以便进行批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让两国和两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中共显然不那么欣赏他所倡导的公开性和民主化，认为那会导致社会动荡，破坏安定局面，不利于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进而危及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尽管如此，中国领

领导人还是未能预料到苏共竟这么容易丧权、苏联会那么迅速解体。这些都对中国的决策和政治选择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中国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状况

由于苏联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对中国的冲击极大，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于有关苏共丧失执政地位、苏联国家解体原因的研究成果格外关注，明里或者暗里给予的经费支持也非常有力度。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获得国家科研资助通常比较困难，把课题研究成果出版成专著也需要花一笔不小的数目，但与苏联有关的课题立项，通常都能获得资助，有时甚至因多人申请同样的研究课题而导致重复劳动、重复支出，也不足奇。

从1993年到2006年，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批准立项的研究苏联解体问题的课题有：“论苏联兴亡”（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所陆南泉，重点项目^①）、“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所许新，一般项目）、“苏联兴亡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王忍之，一般项目）、“苏联演变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中国人民大学东欧中亚研究所周新城，一般项目）、“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体制转轨研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六局陈凤翔，一般项目）、“苏联剧变中的社会阶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黄立葵，一般项目）、“民族主义与苏联解体”（中央编译局彭萍萍，一般项目）、“苏联解体工程中的苏联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刘爽，一般项目）。

从1992年到2001年，发表在国内报刊上探讨苏联解体原因的文章就有600多篇，出版相关专著有30多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著作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的毁灭》（谭索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苏联兴亡史纲》（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苏联兴亡史论》（陆南泉等主编，人民出版社，2004）、《苏联兴亡史》（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苏联演变与社会主义改革》（陈新明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周新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苏联东欧国家的演变及其历史教训》（周新城、关雪凌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陆南泉、姜长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大国转型发展

^① 目前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经费约50万元，一般项目7万元。

之路：中俄（苏）国家控制能力的比较研究》（关海庭著，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国家社会科学规划1997年度项目）、《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周新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八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点课题项目）、《苏联剧变新探》（宫达非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苏联演变的历史思考》（江流、陈之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在国内引起反响最大的是八集DVD教育参考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它是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200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的最终研究成果，由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专家学者集体完成。该电视片的解说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以内部报告的方式整理、印刷和传阅。解说词的核心观点是：苏共丧权和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共产党内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关系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归根结底是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该片具有很大的震动、威慑效果。

此外，翻译出版苏联著名领导人及其助理、西方驻苏联著名外交官的回忆录，是中国的苏联问题研究的另一重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雷日科夫、克留奇科夫、切尔尼亚科夫、马特洛克等人的回忆录在中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不同的身份背景，在苏联剧变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就会对那个时期的历史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让人感觉到，苏联解体最后时刻的政治对立远未结束。

最新一本译著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辑的论文集《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月版），它是由戈尔巴乔夫作序、二十余位1985~1991年间处于苏联改革潮头的核心人物撰稿的重要著作。标题中的“奔向自由”是中文出版单位加上的，意指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本意是给苏联更多自由，有明显的褒奖之意。

二 对苏联剧变根本原因的不同见解

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剧变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且所提及的因素几乎涉及苏联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但是，当讨论其根本的或者说主要的原因时，意见的分歧则相当明显。其中，多数学者较倾向于从历史根源上寻找答案，强调说“苏联传统体制由

于弊端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进入了死胡同”。^①在这部分人看来，苏联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陈旧的思想理论。主要是指苏共在思想理论方面长期执行教条主义方针，不能实现理论创新和思想解放，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不能赢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理解和信任。^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不肯放过，斯大林认定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魏纳的控制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有机合成化学为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伪科学。正是苏共在理论上对创新的扼杀，使苏联在20世纪后半期痛失世界信息产业革命带来的技术更新良机。

二是错误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苏联经济体制的最突出弊端是备战性、粗放性和封闭性，因此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资源严重浪费、科技成果转换滞缓、与世界发展进程脱节等严重后果。当然，最严重的是百姓的生活得不到改善，人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面临危机。^③

三是僵化的政治体制。有人把它看成是苏共丧权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原因。其主要问题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过分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参与；党内领导和监督机制不健全，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干部任命制等做法造成了以人治代法治、以权力谋私利、打击异己杜绝监督的恶劣现象。^④在这样的体制下，苏联造就了两种干部：一种是能力平庸但听话的干部，另一种是处事圆滑、善于见风使舵的人。这两种干部排斥了大批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人，长期脱离群众，甚至害怕群众，因此，一旦有政治考验，势必随波逐流，作鸟兽散。

四是失败的民族政策。具体表现在缺乏科学的民族政策，简单地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斗争，忽视甚至有意抹杀民族差别，粗暴对待宗教组织等。^⑤

前文所提电视片的作者们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主张

① 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世界经济》1996年第9期，第16～20页。

② 刘克明：《苏联剧变的历史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4年第1期，第61～65页。

③ 牟正纯：《论斯大林模式对苏联解体的影响》，《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第27～28页。

④ 姜长斌、左凤荣：《应该科学地总结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第132页。

⑤ 陈建斌：《教训与反思：苏联解决民族问题的十大失误》，《东欧中亚研究》1994年第1期，第70～78页。

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苏共丧权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没有他就不会有苏联的剧变，因此是他出卖了社会主义。^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剧变是有责任的，但是次要的，历史积累的问题是主要的，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要理解他进行改革的正确初衷和面临的复杂局面。^② 例如，左凤荣、姜长斌在《〈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史实质疑》一文中指出，把苏共亡党的责任都推到戈尔巴乔夫的身上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犯了许多错误，他有责任，但他的许多政策措施是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采取的，也不是他的个人行为。如在反酗酒的问题上，利加乔夫的作用并不比戈尔巴乔夫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复杂的，他采取的许多措施不妥，但他在改革之初特别推崇列宁，试图以列宁晚年的思想为指导进行改革，“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改变的只是党的领导方式，而不是取消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自己亲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各级党委书记也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直到1990年他才开始按三权分立原则进行政体改革。有人把苏共下台归结为修宪、取消宪法第六条，但是在1977年以前的苏联宪法里并没有这一条，苏共不是照常执政吗？这里需要思考的恐怕是苏共应该怎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信任，在这里起作用的恐怕是政策而不是法律规定。为什么“苏共中央在戈尔巴乔夫的逼迫下自行解散”？戈尔巴乔夫怎么有这么大的权力，这难道不是体制问题吗？^③

不过，基于中国左倾传统的深刻程度，电视片的观点和倾向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也有不少呼应者。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吴恩远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是苏共丧权的决定性原因，应充分肯定斯大林及其创立的社会制度对苏联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汪亭友认为，斯大林经济模式垮台不是必然的，越南和古巴是反证，关键是能否正确地对其进行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马列所所长马宗富认为，苏联解体意味着政治斗争的全球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是关键；在这样的斗争中，控制舆论是必需的，而且引用俄罗斯作家邦达列夫评价苏联改革时期

① 周新城：《对世纪性悲剧的思考——苏联演变的性质、原因和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4、19页。

② 陆南泉：《吸取苏联剧变教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思考》，《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第42~49页。

③ 参见《改革内参》2007年第2期，第37~39页。

出版工作的话，“在6年当中，（某些）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①

与中国学者的非黑即白式判断不同，俄罗斯当权者的态度则更令人玩味。普京本人在2000年正式成为俄罗斯总统之前，在回答俄媒体提问“怎样看待苏联解体”时说过，“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因为是苏联，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因此，普京在遇到有关苏联时期重要标志（国歌、军旗）时，总是力排众议，反对“数祖忘典”。但是当有人试图恢复苏联时，他却会正告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

三 学术观点分歧对政治选择的影响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要“在分析苏联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更深刻地对中国的改革进程和措施选择进行反思”；“曾经困扰苏联当时改革的问题，也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②

但是，在中国，在评价斯大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问题上及由此引发的对苏联体制认识上的分歧，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社会政治转型道路的选择。像《求是》、《学习时报》、《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内参》、《百年潮》等有分量的政治刊物均已介入这场历史再评价问题的论争。

争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会不会出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与邓小平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③的论断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

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党内出问题即发端于理论和观念上的错误。对于苏联共产党来说，就是始于戈尔巴乔夫开始的改革步骤：放弃马克思主义

① 曹长盛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第273页。

② [俄]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2~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0页。

的主导地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搞选举民主。为了解释自己的观点，这些人在公众和领导人面前反复强调，俄罗斯人“正在后悔当年为什么没参与‘8·19’事件或对事件表现得如此冷漠……觉得没有什么比苏联时代更让人有荣誉感、幸福感”；甚至讲，“51%的人认为苏共有可取之处”。^①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引用了中国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据称，江泽民同志讲过，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还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过，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从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到戈尔巴乔夫公开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文没有注明出处——作者）。还有文章报道，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说，“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如果党失去对生活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②再如，中央党建研究所研究员沈宗武认为，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多党制和私有化是苏共丧权的主要原因，认为中国应该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苏共的问题是出在党的领导体制，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过度控制上。因此，应当适当放松相关控制。

对戈尔巴乔夫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责，有人反驳说，意识形态属于社会意识和精神范畴，是最不能强制接受的，而苏共长期依靠行政手段，迫使民众接受一套教条的说教，不仅没能说服群众，而且就连那些理论精英们自己都未必真心认同自己宣讲的东西。因此，才会在持不同政见者的针砭下、在来自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学说和思潮面前，出现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束手无策、一败涂地的悲惨结局。^③那种过分强调苏联剧变中意识形态自由化因素的做法，必然会引出西方“和平演变”是罪魁祸首的结论，进而否定对外开放的政策，违背了邓小平确定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思路，是不可接受的。^④

① 2007年1月14日《南方周末》。

② http://www.china.com.cn/xxsb/txt/2006-11/28/content_7420377.htm。

③ 姜长斌、马龙冈：《以科学社会主义观认识苏共意识形态的消亡（下）》，2007年3月19日《学习时报》。

④ 黄宗良：《苏联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内参》2007年第2期，第31～34页。

在批评国内某种为斯大林集权体制辩护的声音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俄罗斯人怀的是什么旧？”^① 经过调查发现，俄罗斯人怀念的是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怀念那时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即怀念分崩离析的大国，而不是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由此断言“现在的俄罗斯人都想回到苏联时代”是无稽之谈。即使是有 51% 的人认为苏共有可取之处，也不意味着认同它的绝对领导和无限控制。^②

当然，对戈尔巴乔夫的功过，也应有公正的评判。一方面，他在苏联推动了对苏联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进程，结束了冷战，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应该加以肯定；但另一方面，由于他试图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对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放任自流，苏联剧变的发生及后果超出了他的控制，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是失职的。因此，苏联解体之后，在世界各地演讲的戈尔巴乔夫却自 1989 年访华之后再也没到过中国。这可以算是中国领导层对他在苏联剧变中负面作用的一种表态。

与此同时，中共的领导人也不只在为苏联惋惜，也在理性思考。苏共这么大一个党在被取缔时，竟然无人反抗，这只能说明它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因此，作为执政党，如果想得到民众长久的拥护，保持自身的执政地位，就要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些都是近几年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治国理念。

此外，中共在 1990 年中央全会上就已经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认为能否做到这一点，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而且还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政体制的改革也都是紧紧抓住党群、官民关系，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这两个首要问题，这也充分表明中共的领导层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改革的方向也是明确的。只不过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多做少说，绝不争论。恐怕这也是从戈尔巴乔夫夸夸其谈的作风中得出的教训。

① 黄宗良：《苏联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内参》2007 年第 2 期，第 31～34 页。

② 黄宗良：《苏联剧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内参》2007 年第 2 期，第 31～34 页。